

红 枫 颂

——中共弋阳党史人物传



黄 山 书 社

红 枫 颂

——中共弋阳党史人物传

江西省弋阳县党史办公室编

主 编 陈家鹦

副主编 李松和 涂新华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于志斌

封面设计:俞石钟

红 枫 颂

——中共弋阳党史人物传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二七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06 字数:139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

ISBN7—80535—878—8/K·478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序 言	汪东兴(1)
方志敏	(4)
邵武平	(18)
邹 琦	(49)
余汉朝	(57)
方志纯	(66)
吴克华	(82)
汪金祥	(126)
谢 锐	(138)
陈云龙	(155)
吴长武	(167)
缪 敏	(182)

序 言

汪东兴

弋阳，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早在二十年代中期，方志敏就在家乡办起了贫民夜校，宣传马列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发动了漆工镇暴动；1927年底，方志敏和他的战友邵式平、黄道等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并领导了颇有历史影响的弋横暴动，从此领导弋阳及赣东北人民进行了开创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这块赣东北根据地，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被毛泽东同志称作“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赞扬这里的闽浙皖赣省为“模范省”。作为“暴动的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弋阳，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色政权存在有8年之久。

新中国的红旗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弋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献出了无数可贵的生命，仅在革命烈士册上留下姓名的就有近万名。我所熟悉、影响较大的有方志敏、余汉朝、邹琦等人物，方志敏是革命英烈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年，叶剑英同志得知方志敏牺牲，万分悲痛，他满怀崇敬之情写下了七律一首：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叶帅对方志敏的赞诗，又和诗一首：

千年青史永留红，
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
弋阳依旧万株枫。

的确，在方志敏牺牲后，他的战友、亲人以及人民群众中更多的革命者挺起胸膛，沿着革命先烈足迹，以更高昂的斗志又继续战斗、前进了。

直至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仍十分怀念方志敏。我耳闻目睹，他老人家曾多次颇有感慨地提及方志敏。他说“方志敏同志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革命胜利了，一大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幸存者，在党的领导下，又走上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邵式平，是方志敏的亲密战友，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到中央苏区，又经历了万里长征，毛主席曾亲热地称赞他“性格豪放的邵大哥”，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江西工作，为建设和发展江西的各项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

方志纯同志在方志敏的直接影响下，大革命时期便投身革命活动，曾为创建赣东北苏区作出过重要贡献，解放后长期在江西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刻苦工作，作风俭朴，成绩是显著的。

吴克华少年时期便投身家乡火热的土地革命斗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我军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汪金祥同志土地革命时期便投身革命，为革命和建设事

业献出了毕生精力，特别在保卫工作战线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缪敏，学生时期便投身革命，成为方志敏志同道合、忠贞不渝的革命战友和伴侣，解放后她为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成绩。

还有谢锐、陈云龙、吴长武等这些同志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便参加革命并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考验，于解放后仍从事人民军队的建设。他们继承方志敏等革命烈士的遗志，跟着中国共产党奋斗终生，虽未献身于战场烽火之中，但他们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精神，对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呕心沥血，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形象如傲霜斗寒的红枫，高大而挺拔，如霞似火，光彩照人，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多年来在征集大量历史资料和有关人物材料的基础上，为这些在党的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影响较大的弋阳籍人物分别撰写了传记。这些传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风朴实，有较好的可读性。

在中共弋阳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党史办的同志又将这些传记编辑成书，名为《红枫颂》公开出版，我想，这无论从积存地方党史人物资料方面，还是从颂扬革命前辈英雄业绩，弘扬革命精神，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传统教育，都是很有意义的。

方志敏

(1899~1935)

史 群

方志敏，原名远正，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1899年8月21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童年曾在家读私塾，因方志敏从小异常聪明，颇有天资，“启蒙一年所读的书，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多。”因此，深得祖父方长庚老人的喜爱，并受到本村私塾老先生的器重。随着祖父病故，叔伯分家，家庭生活每况愈下，到15岁那年，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务农。

1916年秋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始取学名志敏，号慧生。在高小读书时，他勤奋学习、思想活跃，大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1917年，方志敏团结家乡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发起组织九区青年社，其成员绝大多数为该县九区农民子弟。它的宗旨是“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不久，该社又扩大为弋阳革命青年社。方志敏多次利用这个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活动。1918年，全国各地反对北京段祺瑞卖国政府进一步投靠日本的爱国浪潮冲击到弋阳，极大地触发了方志敏的爱国激情。他愤慨写下了：“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的誓言，公开贴在学校布告栏里，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爱国演讲。这时，方志敏有过幼稚的幻想：高小毕业后，去报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升上去，带几千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又想高小毕业后，去从事实业，积到几百几千万家产，一齐拿出去，练海陆军，去打东洋。读西洋史，想做拿破

仑；读中国史，又想做岳武穆。他在《可爱的中国》一文描述：“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真纯入迷。”他曾以青年社成员为骨干，发动青年学生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带头抵制和查禁日货，并在校园、街头发表爱国反帝演讲。

1919年秋，方志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弋阳县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1920年秋，发起组织“甲工”学校学生自治会，被推选为自治会负责人暨南昌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1年春，经袁玉冰、黄道介绍，加入进步社会团体“江西改造社。”这个社的宗旨：“将黑暗的旧江西改造为光明的新江西”，并出版社刊《新江西》，方志敏积极参与《新江西》的编辑工作。同年因揭露校方腐败，得罪于校长，遂被开除学籍。

1921年秋，方志敏在九江考取教会学校南伟烈大学。在这期间他仍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在校发起组织“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这里，他有机会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报刊，思想日新。

1922年春，方志敏参加了“反基督大同盟”，带领进步学生与九江市各阶层爱国人士一起，走上浔阳街头，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活动。这一政治活动触怒了九江反动当局，要南伟烈大学开除方志敏的学籍。正当方志敏精神苦闷的时候，接到朋友从上海寄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报，方志敏非常拥护它的政治主张，于是他决心去上海寻找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并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此，没等校方开除，方志敏

就主动提出退学。

1922年7月，方志敏退学后即刻漂泊至上海。他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因家贫。”“我再也不愿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了。”方志敏在沪结识了江西籍共产党人赵醒侗，并经赵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方志敏旅沪期间还结识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向警予等以及邵力子等进步人士。同年秋，方志敏离沪返昌负责筹办“南昌文化书社”，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江西地方团组织设立活动据点。

1923年1月，方志敏与赵醒侗等在南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3月中旬，南昌文化书社遭查封，方志敏因患病住院幸免缉捕而一度逃亡南京。居宁期间参与编辑《新江西》（半月刊）等革命活动。创作并发表了《我的心》、《同情心》、《慰友》等进步诗文。同年9月返回江西，继续从事青年团的工作。

1924年3月，方志敏由赵醒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方志敏一面积极参与江西地方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一面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参与发起组织“国民会议江西促进会”，竭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五卅”惨案发生后，方志敏和赵醒侗领导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投身全国反帝爱国斗争的浪潮。

1925年7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成立，方志敏与赵醒侬等共产党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志敏并兼任农民部长，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同年冬，方一度深入家乡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他在湖塘创办了“贫民夜校”、“旭光义务小学”，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贫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创建了赣东北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同时还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在漆工镇齐川源村发展“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的斗争。从此，赣东北农村兴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6年5月，方志敏以江西代表身份，出席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见了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和中共广东农委书记彭湃。同年11月上旬，他在南昌近郊组织农民，协助北伐军攻占南昌市。北伐军于8日进城，次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方以执委兼农民部长的身份，及时委派了一批农运特派员，分赴全省各地指导农运。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弋阳九区农民协会的领袖方远杰和黄镇中等根据方志敏关于要夺取武装并委派党的同志掌握地方政权的主张，于11月下旬，举行了“漆工镇暴动”，占领漆工镇派出所，缴获了两条半枪。这就是人们传颂的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

1927年元旦，国民党江西省第三届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方志敏推举为临时主席。会间，方志敏获选票数名列前茅，可是省党部掌实权的执行委员段锡朋，采用蒋介石“圈定”的手法，竟把两度当选的方志敏及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除在外。

2月20日，方志敏又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江西省首次农民代表大会。蒋介石、郭沫若以及农民国际代表达尔汉诺夫等出

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等故伎重演。方志敏电告毛泽东，得毛电复：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圈定办法！方发动代表与蒋开展斗争，揭露贿选，挫败了蒋“圈定”的阴谋。会议结果，方志敏当选省农协第一执委兼秘书长。

同年3月中旬，方志敏在省农协接见了万年县的农运领导干部。他明确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器”。此时，方志敏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农民运动。3月底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粤湘赣鄂农民代表联席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委。会间，他与彭湃等坚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方志敏还被邀请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演说，深受全体学员欢迎。4月初，方志敏返赣后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之一，筹备员可代行省党部职权。这时，方志敏在南昌主持开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他不仅亲自给学员讲课，还聘请时任南昌公安局长的朱德来讲军事课，并通过朱德弄到100多支枪武装省农民自卫军大队。5月9日，他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回赣后，即赴鄱阳等地传达“五大”精神，推动农运向武装斗争发展。在南昌，他筹集70支枪运回弋阳，加强家乡农民自卫军力量。然而，此举却遭到党内右倾分子的阻扰，并为此受到警告处分。

方志敏及其他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引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不安。6月5日，朱下令强行“礼送”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出境。鉴于南昌无法立足，方志敏主动要求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临行前，他与在南昌就读的弋阳籍学生缪敏匆匆结婚。彭湃、罗亦农等同志参加了他简朴的婚礼。此后，方志敏告别新婚的妻子和朝夕相处的同志，化名祥松在赣西吉安等县巡视并指导农运工作。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这时国民党驻吉安的反动军队也将农民自卫队包围缴械。局势恶变，方志敏很快又无法坚持活动，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险恶。同年8月中旬，方志敏从吉安返回赣东北。在鄱阳，与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不期相遇而得知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异常兴奋，立即返回家乡弋阳，满怀信心地打算“重起炉灶再来干”。

方志敏回到家乡，于10月与11月之交，发动了约3000人农民武装攻占弋阳九区烈桥街，将张念诚等土豪劣绅“概行逐走”，农民废了租，平了债。接着，方志敏在烈桥窖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等5县党的联席会议，进一步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会议决定实行武装暴动，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宣传纲领，决定了武装暴动的形式，建立了武装暴动的领导机构。会后，方志敏化名汪祖海亲赴横峰县楼底蓝家一带活动，以“上名字”的形式组织了农民革命团。12月10日，当局政府收煤捐税的官员和警察到楼底蓝家小煤窑来催逼捐税与农冲突。借此机会，方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人组织和发动了弋阳、横峰两县联合武装大暴动。很快，由数万农民参加的暴动进入了六路进军的高潮。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红旗招展，打土豪，斗恶霸，烧借据，毁契约，废债务，劈粮仓，显得热火朝天，声势浩大，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当时，赣东北传诵着一首歌谣：

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

领导共产闹革命，为的是救穷人！

弋横暴动后，国民党当局立即派重兵镇压，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革命根据地形势危急。1928年4月，方志敏任弋阳

县委书记。为应付日益恶劣的斗争形势，他变换斗争方式，解散了原暴动时期的农民革命团，从中挑选几十名骨干，集中枪支，组成工农革命第2军第2师第14团1营1连。赣东北第一支正规红色武装由此诞生。

1928年6月，赣东北革命斗争形势更加险恶，方志敏等已退到方圆不满50里的游击根据地磨盘山一带。为了统一思想，明确方针，6月25日，方志敏在弋、横两县交界处方胜峰召开了弋阳、横峰两县干部会议。方志敏在会上严厉批驳了某些干部埋枪逃跑、放弃根据地的错误主张，决定立足根据地，依靠群众，伺机反击，坚持长期艰苦斗争。会后，方志敏大义灭亲，亲自将其反动叔父方高雨镇压。7月初，工农革命军正式更名为工农红军。此后的一年中，赣东北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不断给敌人以坚决打击，终于粉碎了敌人对弋横根据地的4次“围剿”，并在战斗中总结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战略战术。随着反“围剿”的不断胜利，革命区域发展到信江流域的几个县，红军也由1个连壮大为江西独立第1团。继1929年3月初建立中共信江特委之后，同年10月1日召开了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此后，方志敏付出全部精力来从事苏区的发展和建设。他重点解决了苏区土地、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主要问题，并为此制定了各种有关政策法规，使苏区呈现蒸蒸日上、稳步发展的局面。

1930年2月，方志敏任信江军委会主席。同年7月22

日，根据中央军委长江局的决定，方志敏在乐平众埠街将红军独立团正式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为了扩大根据地，他两次率军攻打景德镇，后又出征闽北，使赣东北根据地和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块较稳固的根据地。为此，毛泽东曾在其名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被誉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而予以肯定。

1931年7月，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全权代表曾洪易来到赣东北，改组了赣东北省委，将黄道等优秀的赣东北地方干部排挤出省委之外，并提出要“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此时方志敏虽然仍担任赣东北省苏维埃主席，但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却大为削弱了。时适逢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围剿”并施行“堡垒政策”，曾洪易则采取“针锋相对”，提出要“持久围攻政策”。方志敏等反对这一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曾洪易却一意孤行，他撤去了邵式平军委主席之职，后又在肃反扩大化中对红10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加以迫害，置其于死地。因此，赣东北苏区未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1932年4月，方志敏和邵式平指挥红10军在信江河畔的横峰杨家门取得伏击战胜利，歼灭国民党第六师第3团，另击溃敌两个团，共俘敌500余名。“杨家门大捷”后，由方志敏等组建的赣东北另一支主力红军——赤色警卫师诞生了。同年6月，方志敏率红10军二进闽北，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一阶段的重大胜利。同年12月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省，方志敏继任省苏维埃主席。从此赣东北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其区域包括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等大小6块，共50余县，其中已建立了40多个县委（包括中心县委）和20多个县苏维埃政府。主力红军已扩大为两个军和一个（闽北）

独立师。工会组织已发展会员 18,085 人,占工人总数 90%,工人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开展了劳动竞赛,发明创造了枪炮弹药,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农民由于解决了土地问题,发展了生产,保证了革命战争中粮食的需要。财政上增加了税收,保证了红军给养和各种费用的供给。这就是粉碎敌人“围剿”,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3 年初,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将现在的红 10 军改编为红 11 军,现在的赤色警卫师扩编成红 10 军”,方志敏兼任红 11 军政委。1 月 25 日,红 11 军在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邵式平,军长周建屏的领导下,南渡信江在贵溪上清宫与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红军会师。随后,红 11 军活动于信江、抚河流域的交叉地带,开辟新苏区、并配合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早在 1931 年 11 月 8 日,鉴于方志敏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因战事绵延、交通不畅,直至 1933 年 3 月 23 日闽浙赣省苏二大期间,才正式举行授勋仪式。方志敏致答词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我接受勋章之后……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在苏区“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发展的各个阶段,方志敏作为主要创始人,他提倡并身体力行苏维埃的民主,奉行刻苦精神,披肝沥胆、励精图治,以全身心扑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之中。

他特别注意苏维埃政权对于工农群众必须实行高度的民

主,突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疾苦,不称职的干部可由群众直接撤换。1930年苏区大发展,他随军行动时,沿途调查到少数新干部竟沿用旧政府的一套对待群众,他为此撰写了《苏维埃干部与群众关系的问题》,教育干部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方志敏经常深入下层,巡视各地,调查研究。在他主持制定的《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中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在他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广大干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同群众结成血肉关系,使苏维埃成为“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

从根据地创立之初,就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经济建设问题。方志敏曾在回顾苏维埃的创造精神时说:“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苏区初创时期的财源,主要是“取之于敌”,即打土豪罚款和打城镇筹款。亲自兼任苏区财政部长的方志敏敏锐地认识到这只是权宜之计。1930年苏区大发展时,他主持制定了一整套财政政策,其中心是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到1931年后,苏区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其中粮食每年有几千万石可供出,棉花自给自足,油茶竹木等每年生产价值近300万元;军工、纺织、造纸、制糖等工厂和煤炭、陶瓷、砖瓦、石灰等由工人集资经营的生产合作社遍布城乡;商业,据1933年统计,群众集股的消费合作社仅赣东北就有83000股,计60多万元资金在流动。贮粮合作社达30多万股,其中白区1万股。苏维